

■第一阅读



# 孤独的绝唱

——我写《八大山人传》 □陈世旭

是八大山人研究极有收获的时期,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从而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八大山人研究再度中兴的时代契机。由此,八大山人的研究,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八大山人研究学科。

八大山人的研究者不少是海外学人,特别是中国港台地区和美国、日本的学者较多。有的穷毕生精力于此,成就卓著。至于鉴定专家,多又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一批老专家为八大山人的研究作出很多努力,但年事渐高;进入21世纪,新一代研究八大山人的专家崭露头角,在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方面,在字号、身世方面,在作品的解读方面,继有不少创获,且个人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

支离的身世,怪诞的画面,禅偈般的诗文,天书样的题款似哭似笑、非哭非笑,太多的迷惑和不懂,一个孤苦而睿智的灵魂哭哭颠颠间为我们设下一个个悬疑,也留下无尽猜想的空间。仿佛黎明前的黑暗天幕下那一颗最耀眼的孤星,伴着沉落的残月,幽远而寂寥地闪烁。300多年后,投射到我们身上的,是他那穿越时空、被稀释被剥蚀之后的微茫的清光。

今天,当我们想要还原八大山人那闪烁的热力和辉煌时,惟一可依凭的就只有那一抹依稀而灿然的光亮。在那抹光亮的引导下进行跨越时空的透视,这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接近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人们从各类支离破碎的卷帙中抽幽发微,将尘封的点滴史实,连贯串并起来,打破文献与文献之间的藩篱,使其中的相关性和紧密性,在同一个事件中,融会贯通于人物、事件的生发与结果,从而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发挥其最大的历史价值。依据雪泥鸿爪,梳理出八大山人身世与生平的大致脉络。严格地说,这部或可称作“传记”的文本只是一部关于传主幽深曲折的艺术思维生成、变化、发展的心理过程的叙述,而且因为传主作品散失的过多而过于粗疏简略。萦绕在八大山人这个名字上的谜,有的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解开,我们可以做的是尽我们所能,剔除那些明显错误的认识,改变一些无稽的谬传。

研究八大山人最可靠的文本依据,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他本人的诗作、信札、书画题跋,以及他同时代人与其交往的各类文字。后者中最有现场感的当属几位与他有直接交往的文人写的他的传记。我所知道的一位是邵长衡,一位是陈鼎,二者皆有《八大山人传》传世。此外,清一代关于八大山人的完整文字还有龙科宝的《八大山人画记》和张庚的《八大山人》。

上述作者留下的八大山人的传记文字,因作者本人所具有的较高素质及其与传主为同时代人,无疑成为研究八大山人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数百年来,八大山人研究日益丰富,日益精确。八大山人的身世逐渐浮现于模糊昏暗的历史卷帙的表面。这使得人们有可能凭借这些研究成果逐渐了解八大山人的一生,依据其思想、画风与书风,以其师承渊源、选题立意、内容主题、造型构图、笔墨形式并联系画家的主观观

条件,廓清八大山人书画的阶段特色和递变轨迹,最大限度地接近八大山人的本来面貌。如此,才使得今天笔者这部抛砖引玉的纪传性长篇文章的写作以及今后学养深厚的大家更为精致的大篇幅传记的产生有了可能。

可以肯定地说,后人对八大山人的研究难免有推测、想象、甚至杜撰的成分,但主流是严肃的、审慎的、负责任的。这也就是今天八大山人研究中,许多悬疑正在被一一破译的根本原因所在。随着八大山人研究的日臻科学,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诠释,将更加切合史实。

依据以传主的人生经历为“经”、以传主的艺术表现为“纬”的总体构思,我为这部传记所做的工作,除了充其量调动我自己极为有限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便是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的分析、鉴别、比较、选择、采信,力避牵强附会,剔除蓄意作伪,尽最大可能用八大山人和他同时代人的文字说话,杜绝所谓“合理想象”。宁可为未曾发掘的可靠史料留下空间,为尊重历史、尊重艺术、尊重八大山人的读者留下想象的尊严,也绝不以轻薄平庸甚至狂妄的杜撰演绎而使谬种流传。从而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对八大山人的认识并借以表达我所崇尚的艺术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传记应该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工作的成果。借此机会,对所有在八大山人研究工作上作出巨大贡献的海内外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任何一部传记都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面面俱到。拙作有选择地忽略了对传主许多个人生活场景的挖掘,更无意以所谓奇闻逸事、风情流韵吸引读者眼球,注意力只在梳理传主的人生与其心理、人格、内在创作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一位伟大艺术家及其伟大艺术的产生,找出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而写出诸多有世界影响的艺术家中的“这一个”。

使数百年后的我们最欣慰的是,八大山人存世的资料虽数量有限,但却极为深刻地展示出的他的心灵史是充盈的、完整的、确凿无疑的、瑰伟绝特的。

当然,由于我个人的才疏学浅,对典籍和史料的孤陋寡闻、吞吞吐吐、望文生义,甚至张冠李戴,造成的误读、讹讹和硬伤在所难免,受到衮衮诸公“拍砖”几乎是必然的。这些只能由我个人承担无知之责。敬请方家及读者见谅,并予以批评教诲。我想,这也会是对八大山人研究的一种有力推动吧。

追寻八大山人80年的人生历程,敲下最后一个句号的瞬间,就像排队时背负超过我当年体重一倍以上的货包,颤颤巍巍地走完好几里泥石路,终于可以放下,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成与败,臧与否,都只能凭凭裁决了。我惟一还想重复的是30年前我在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洲》时用过的一个句式:

终于开始了,终于坚持了,终于完成了。  
我已尽力。  
(《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陈世旭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 以史家眼光和文学形式为张闻天立传

□陈先义

裔兆宏的史传类文学读物《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全书50万字,对张闻天的历史贡献作了比较客观地评价,应该说,这不仅是研究张闻天这样一个党史人物不可多得的材料,也为党史及延安革命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证。

通读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比较鲜明。首先是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以翔实的且鲜为人知的故事立体地表现了张闻天在延安的革命活动,许多情节和细节,都是第一次披露。从长征吴起镇会师,为刘志丹平反到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从力主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参与解决西安事变,到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清算张国焘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危害,一直到为党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干部所作的贡献,其间张闻天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在作品中得到了详尽的展现。在这些读来感人的故事中,既有张闻天实事求是、敢于承认错误的革命品格和坦荡胸襟,也有他待人处事的磊落情怀和杰出情操,还有关于他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的描述。总之,这是一部立体地全面地地表现人物的传记图书。

写人物,尤其是写张闻天这样的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领导人物,最忌的是为贤人讳,为伟人讳,只写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遮蔽人物走麦城的失误,我们读过的许多回忆录已不乏其例。这样的一种描述,不仅有害人物,也有害党的历史研究,影响对人物和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准确的评价。如果说《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有什么突出特点的,那就是作者在大量占有材料和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为贤者讳,不为名家讳,实事求是地写出了真实的张闻天。作为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进入中央高层的领导者,张闻天是有过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不少的损失。在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深刻剖析自己的历史错误,毫不含糊地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他自我批评说,过去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饰,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癖病碍人看。”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一边同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书中关于延安整风的描述,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章节,中央高层之间当面对面锣的批评,表明延安时代我们的党是清醒的,对党内错误进行毫不留情的坚决斗争,使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泽东之所以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开展党内思想交锋的三大法宝之一。然而,恰恰是这些年,这个法宝被有意无意地放弃,所以,才形成了缺乏同志式监督的贪腐之风的蔓延,形成了有些省部机关,一抓就是一窝、一抓就是一团贪腐分子的危险局面。所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部书关于党内监督和批评的故事,对今天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建设,迫切需要恢复发扬的就是延安精神。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对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张闻天在延安因担任党的高层领导职务,他经历的大事多,可写的故事也很多,作者突出表现他坚持原则、勇于认错、实事求是的坦荡胸怀。书中有许多故事,让我们过目难忘。比如长征途中,在沙窝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本应是政治局委员来开会,而张国焘却带着10多个骑兵来到会场,企图闹事。张闻天见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毫不客气地说:“今晚是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张国焘心怀鬼胎,说陈昌浩作为中革军委常委、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列席会议还是可

以的。张闻天坚决阻拦:列席也不行,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1936年1月,针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张闻天立即发电对其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称“我们政治原则上,有待将来作最后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外,张闻天与王明的斗争,在这部书中也有较多的表现。在写张闻天光明磊落的情怀时,作者在最后一章还特意寥寥几笔写了王明,而正是这样的一些简单描述,对比出了两人品格的高下。在延安,王明企图任总书记的想法受挫后,开始玩两面派手法,一面在公开场合吹捧毛泽东,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专门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而在背后却大肆攻击毛泽东。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共中央电令当时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发表,王明不仅找借口不预刊发,还写诗嘲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样一些对比,在书中比比皆是。

这部书以客观的叙述,让读者对张闻天这样一个党的领导者形象有了全面的认知。通读全书,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作为一个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阶段,正是张闻天,努力协助毛泽东做了党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工作。作为党的领导者,他主编整理了第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创办了第一所马列学院并亲任院长,同时主编了四个主要的党内理论刊物。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全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而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他的态度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贯彻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旗帜鲜明地贯彻实践毛泽东的理论。鉴于当时的共产国际明确主张“中共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

下”,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出来,全心全意向党的宣传工作转移”。这些情节都彰显了张闻天的大局意识。

张闻天可以说还是调查研究的典范。在延安时期,为了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从而建立更具针对性的党内政策,张闻天跋山涉水,在陕北、晋西北作社会调查,在米脂县杨家沟扶风寨调查时,光一次借来的账本就堆满了半间屋子。正是这样一次深入底层的实际调查,使党的高层对陕北的经济及社会阶层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制定出了有效的边区发展政策。张闻天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后来被誉为“东方的《资本论》”。

作为一本纪传体的图书,我认为《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延安时期党内高层毫不留情的思想交锋和交锋看出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风建设的重视。我们还可以看出以张闻天为代表的领导者对理论学习的不懈努力和追求,建立学习型政党,在那个时期的共产党人就已经提出来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张闻天身上看到那一代领袖们不争职位、不谋私利、敢于担当、立党为公的光荣传统。而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各级党政领导应该认真研究和发扬的。毋庸讳言,许多共产党人最优秀的东西如今在不少共产党人身上看不见了,许多好的传统成为我们遥远的记忆。因此,这样一部书不仅研究党史的人值得认真阅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该认真阅读,它当下我们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提供了一面正衣冠的“镜子”。

(《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裔兆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书斋札记

我们知道,中国与世界在相当久远的历史里,其传播途径主要来自纸质平面媒体;但近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是过去时代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文学期刊有着近百年的历史,但比起悠悠几千年传播的传统文化,这只是个短暂的瞬间;但这短暂的瞬间所发生的演变是过去几千年难以企及的,科技的革命、社会的发展,也给它的存在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就是目前文学期刊所面临的困境。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坚信:文学期刊不会消亡,只要这个世界还有文化的传播、精神的追求,文学期刊就不会衰竭。因为文学期刊的存在,并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楼阁上,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经典作品及其强大的人文背景,构成它存在与延续的一种理由;同时,日趨勃发的创作力量,构成存在的现实需要。这不可抛离的两方面因素,决定了文学期刊这一文学形态,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退出它历史的舞台。

但现阶段的文学期刊,因社会转型、传播媒体的多元化导致的生存压力,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并恪守的一个原则,就是文学期刊作为传播文化、灌输文化的功能,决不会轻易改变。只要社会的文化不曾消失,文学期刊立足文化、传导文化的品质,就不会轻易消亡。因而,不管任何时候,坚持纯文学的高雅品位,应是文学期刊始终不渝、永不放弃的信条。也就是说:不管形式或外在有多大的改变,纯文学的品质不能丢失,这就是文学期刊得以存在与延续的真正价值所在。

纵观现有的期刊界,我们发现有的文学期刊迫于办刊经费的压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困扰与制约,已转型为综合类的刊物,文学只占据其很少的比重,可以说,文学元素几乎丧失殆尽。有的尽管刊名没换,但其内容已渗透了许多文学之外的东西,让文学期刊变得面目全非、不伦不类;相当一部分的文学期刊仍坚持纯文学的品质,可由于市场的分化,竞争的剧烈,刊物的生存处境堪忧。

在这非常时期,文学期刊办刊的出路何在?这是我们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只能适应于时代,并着眼于现实,以科学的心态调整好自身。首先,我们必须以包容的心胸,吸纳一切有利于刊物发展的多种传媒途径,促使文学期刊以最具现代形态出现,构成更加立体、多元、相互印证的传播方式,探寻与其他传播媒体沟通交流的更多可能,或许这是较为复杂的融合。但不管如何融合,文学期刊独特品质不应失去,应做到既未失去文学自身所固有的那一种形态,又有机地容纳新兴的传播方式,确保与现实的接轨,这两相顾应的调整,或许将为文学期刊的发展带来崭新的样态。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普遍,交流领域也越来越宽广、便捷,文学艺术之间的沟通也是如此,现在有一种提法叫做“地球村”,基于这一提法,我们也可以大胆提出“地球文学”这一概念,文学既是地域的,又是世界的。真正的文学,应获得整个人类的分享,决无疆域之分。因而,文学期刊要具备面向世界的勇气,除了刊登国外作家的作品,也欢迎国内作家的来稿,真正做到让文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成为无障碍的通道。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现在比过去拥有更优越的条件,一是文学借助网络这一通道与世界的交流更为频繁通畅,但最大的障碍仍来自外语翻译。文学的翻译必须具备比一般的翻译更为专业的力量,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办一本将本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直接翻译介绍并投放到世界的定期刊物十分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让世界及时了解我国的文学动态,还可以扩大本国作家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借助强有力的翻译力量,承办面向世界作家的文学期刊物,这样,双向对应的交流,让中国与世界的文学连结得更为迅捷、紧密,对国内外文学现状的把握也将更为清晰、到位。

但基于现状的考虑,以及语言沟通交流物流通等方面的限制,我国绝大多数的文学期刊仍立足于国内,创作者与读者也主要来自国内。谁都知道我国是人口大国,每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将构成一个庞大的系列;一本刊物如果能吸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关注,就会引起较大的反响。因而,文学期刊新时期的办刊方向除了自身力量的强化外,还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构成,以此作出适合自身的准确定位。有了这一定位,对作品的选择与定向就有把握。另一方面,文学期刊不要将立足点局限于自身所框定的那一区域,要打破地区的界限,实行更大空间的交流与合作;交流的方式应寻求多样化,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文学期刊的传播空间,还能扩大作家之间相互认识;我们甚至可以进行跨学科、跨学报之间的合作交流,这样,读者可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认识文学之外更多的东西。

文学刊物在栏目的设置上,也应根据现时的审美等需要,作灵活机动的调整,只要不脱离文学这一大主题,任何灵活自由的转换都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我们还可以采取走出去办刊的方式,扩大社会、学校等影响,让文学放下架子,深入生活,以此刺激与影响更多青年的创作欲望,让文学与人们的心灵更加贴近。

文学刊物几十年来,其栏目设置基本上框定于四大块,即小说、散文、诗歌、评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固有的设置也应有所思考、调整、创新,并不是说文学刊物要从这四大块的限制中超脱出来,开辟出另一片星空,这四大块仍是文学的基本形态,谁也无法轻易将其割裂。在形态不变的基础上,我们调配文学刊物既要讲究这四大块的合理调配,也不必过于强调这四大块的均衡分布,有时有所侧重,或突出某一类型,反而会受到特殊的效果,比如开辟探索小说专号,评论紧随其后,对此进行针对性的研讨;散文也可以开辟演讲、论说等栏目,只要不脱离文学这一品质,与其相关的栏目都可以大胆构建,让栏目设置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也易与现实生活搭上关系。同时,也可以设定一个命题,让文学的某一形态经过多层次、多角度、多角度的展示,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而变得更全面,更接近心灵的一隅。当然,这样的设置操作起来要多花费想象、耗费心力。文学需要想象,文学期刊的建设同样需要想象,我们甚至可以打破固有的模式,只要能达到最佳的阅读效应。比如,用一期的版面来刊登一本小说集、诗集或散文集,这一运作方式比起出版发行渠道,或许显得时效性更强,传导的效果更佳。

发表优秀作品是文学期刊的职责范畴。许多文学期刊的稿源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自发来稿,二是刊物约稿。我们不能墨守陈规,要根据刊物的需要,灵活地疏通这一重要通道。可以采取与作家签订合同的做法,让某一重要作品在刊物上连载,还可以寻求更多样的途径,让稿源渠道变得更为丰富,并具有定向与自主选择的功能。

我们还要建立与作家的合作与共建机制,即与作家建立起期刊的合作与同盟关系,使需求或预约的作品有稳定的渠道。同时,改变固有的编辑流程,寻求让作家参与的编辑办刊新模式,让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过程变得更加自由开放,运作更灵活,以尽可能多的手段调动起为文学期刊服务的潜在动力,让文学期刊变得更具活力。

科技发展十分迅速,谁都很难对未来的10年作出准确的预期,变化的突然性与不可预测性,让人们很难从逻辑上有个清醒的推测。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期刊对未来的惟一的选择,就是选择自身,立足自身,在不断变化之中调整自身,完善自身,寻求更加多元、丰富的表现形式,展示自我的无限可能;也就是说,文学期刊在这急剧变化的趋势下,要怀揣一颗博大包容的心,从科技的过程中,从其他媒体的传播过程中,汲取并转化成为属于自身的艺术形态,真正做到不常时代变化多大,文学期刊所葆有的那一内在功能即文化的传播功能,永远不变。

数字时代的文学期刊

□郭志杰